

外来移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策略研究

魏弋涵,梁秀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外来移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呈现多维复杂性,兼具替代与互补效应。总体而言,移民流入对本地劳动力就业率的平均影响有限,但存在显著技能与行业异质性:高技能移民与本地高技能人才竞争激烈,而低技能移民因职业隔离和本地劳动力向上流动,对低技能群体冲击较小。同时,移民通过填补岗位空缺、促进分工和扩大需求,创造了巨额宏观经济盈余。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户籍壁垒、公共服务不均、低技能排斥及技能错配等结构性挑战。为此,应推进户籍与公共服务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实施差异化人才政策,并加强数据监测与评估,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移民融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外来移民;劳动力市场;技能异质性;移民盈余

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当前,中国正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朝着移民输入国转变,外来移民已然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的关键力量,大规模的移民流入在填补劳动力缺口、激发市场活力之际,也给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工资水平以及社会融合带来了复杂且深远的影响。当下关于外来移民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到底是竞争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共生关系,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公共舆论方面都存在明显分歧,这些争议突出了系统性地探究移民经济影响的内在机制与效应的紧迫性,本文借助理论探讨,客观评估外来移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维影响。基于此,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给出科学建议,期望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时达成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

一、外来移民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机制

外来移民给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是移民经济学领域里一项关键的研究课题,移民所产生的影响有显著的异质性以及复杂性,基于此,本文对相关的经典理论给予梳理,并且着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之下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搭建起一个以技能分化以及行业分割为核心内容的分析架构。

(一)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

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与本地劳动者的关系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为两种效应:

首先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一旦外来移民和本地劳动者在技能、职业以及行业方面高度相似,那么二者便会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这种效应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原因在于该市场岗位门槛较低,劳动力同质化程度较高,

其次是互补效应(Complementarity Effect),要是外来移民与本地劳动者在技能上存在差异,那么二者有可能形成互补协作关系。互补可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技能互补,也就是高技能移民同低技能本地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展开协作,另一类是职业互补,即移民涌入本地居民不愿意从事的3D(Dirty, Dangerous, Demeaning)行业,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保障了城市经济的顺利运行,该效应或许借助促进产业分工以及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带动本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1]。

在中国语境下,替代与互补效应同时存在,但其具体表现形态深受户籍制度、产业结构等本土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二)技能偏向性

移民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技能偏向性(Skill-Biased Impact)。基于中国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就业率的总体影响在-0.04%到-1.99%之间,但是此影响对低技能本地劳动力微乎其微,对高技能本地劳动力的冲击则非常显著^[2]。

剖析其背后原因,是因为本地的低技能劳动者

作者简介:魏弋涵(2001—),男,贵州贵阳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移民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移民管理;梁秀波(1976—),男,河北廊坊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移民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移民管理。

和外来的低技能移民,虽说在理论层面存在可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却有着较大的行业以及职业隔离现象,本地劳动力往往会倾向于去选择那些相对更体面且稳定的服务业岗位,与之不同的是,外来移民更多的是进入那些体力消耗比较大、人员流动性较强的行业。这样一种并非完全竞争的关系,使得替代效应的强度被削弱了,对于高技能工作岗位而言,一般会对学历、专业知识以及技术有着标准化的要求,这就导致劳动力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外来高技能人才和本地高技能人才在求职过程中,面对的是同一套评价体系,彼此之间的竞争显得更为直接且激烈。高技能移民的流入,会加剧该技能等级的竞争。

(三)移民盈余

虽然移民有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替代效应,不过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讲,移民的净效应一般是积极的,也就是会产生“移民盈余”(Immigration Surplus),国内的学者依据拓展后的移民盈余模型框架,把物质资本、劳动力以及土地要素纳入分析范围之中,计算得出中国的外来移民创造了数量以万亿元计的庞大经济盈余,并且推测其形成机制是生产要素的互补性、要素再配置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效应^[9]。在评估移民影响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其对局部群体的结构性冲击,还应当看到其对整体国民收入以及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

外来移民对于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受到替代效应以及互补效应共同作用的复杂进程,该影响在强度以及方向方面有较大的技能偏向特性,虽然有可能会对特定群体形成竞争压力,然而从宏观层面给予审视,移民借助提升经济效率以及扩大规模,创造出了规模巨大的移民盈余。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可为后续深入剖析中国外来移民的具体影响以及提出对应的策略建议给予清晰明确且有逻辑性的指引。

二、中国外来移民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分析

外来移民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单一且同质化的,而是呈现出复杂多样、具有多个维度的较大特征,移民的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以及工资水平造成影响,不过其影响的方向以及强度会因为劳动力技能水平、行业属性以及移民自身特征等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以下将从总体效应、技能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宏观经济效益这四个层面出发,全面且系统地梳理并深入分析外来移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影响有限

数量庞大的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中国城市,并没有给本地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颠覆性的负面冲击,外来劳动力占比有所上升,对本地居民就业率产生的平均负面影响相对来说较为有限,在这种微弱的总效应背后,其实是正负效应相互抵消之后所形成的净结果。一方面,移民的增加使得劳动力供给增多,职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有可能对部分本地劳动者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移民也扩大了总需求,促进了产业分工的深化,并且填补了特定岗位的空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还提升了经济效率^[4]。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城镇化进程中持续扩张,整体吸收了大部分移民带来的供给冲击,使总体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

(二)影响具有技能异质性

移民所产生影响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其具有的技能偏向性,这种技能偏向性表现为,在不同技能水平方面,移民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呈现出差异化的竞争以及互补关系。

有研究显示,高技能外来移民和本地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呈现出较强的替代性,高技能岗位对通用性较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依赖性更高,家庭财富与社会资本形成的传统就业壁垒在这种情况下被削弱,使得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如此一来,高技能移民的流入给本地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工资给予了更大的竞争压力^[1]。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说明移民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技能相似的群体当中^[5],在中国,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吸引了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进入专业技术和高端服务业,这直接加大了这些领域的人才竞争程度。

相比之下,低技能移民对本地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影响则微弱得多。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情况,其一是行业与职业的隔离。低技能本地劳动力凭借其本地户籍所附带的社会资本和制度优势,更多分布于公职部门、市政服务以及更为稳定、安全的低端服务岗位;而低技能移民则主要集中于建筑、制造、餐饮、零售等市场化程度高、工作强度大、流动性强的行业。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非市场分割,使得两者在就业市场上形成了事实上的“隔离”,直接竞争有限。其二是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升级。部分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在面临移民竞争时,可能会选择向上流动,从事需要一定本地语言或文化知识、移民难以替代的监督、管理或沟通类岗位,从

而进一步减弱了直接的替代效应。

(三)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行业特性,进入门槛的高低状况,是调节移民影响强度的又一关键维度,其中进入门槛覆盖了学历要求、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壁垒以及社会资本需求等多个方面。

在建筑业以及生活类服务业这类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当中,移民流入对于本地劳动力就业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这些行业对于专业技能以及资格证书的要求并不高,从理论上来说本地劳动力与移民之间有较强的可替代性,然而正因为这些岗位大多时候工作环境较为艰苦、薪酬待遇相对较低以及社会保障不够充足等一系列问题,许多本地劳动者主动选择退出这些行业的竞争,为移民腾出了较为广阔的就业空间。这种“自愿性退出”的情况致使在低门槛行业里,移民更多的是填补了本地劳动力不愿意从事的岗位空缺,而非直接进行“挤占”。

在知识密集型公共服务行业中,尽管存在着比较高的学历以及资格认证方面的壁垒,然而高技能移民往往可以契合这些要求。在这些行业里,移民与本地高技能劳动力构成了更为直接的竞争关系,欧洲学者针对本土展开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规律,移民流入使得低收入本地劳动者的工资降低了,不过却提高了高收入群体的工资,部分缘由在于高技能移民与高技能本地人的互补性比较弱而竞争性比较强^[6]。在中国,随着服务业的升级以及高技能人才需求的扩大,高技能移民在这些高门槛行业中的占比持续升高,对本地同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以及薪资水平产生了更为突出的冲击。

(四)移民内部的更迭效应与宏观经济效益

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移民和本地人之间,在不同批次流入的移民群体内部同样有所呈现,新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于早期已经迁入并且取得“准市民”身份的外来劳动力就业率所产生的影响,相较于对本地户籍劳动力的影响而言更大,这也就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着一种“更迭效应”或者“层级替代”的现象。新移民一般是从价值链最底端的岗位开始起步的,这有可能会挤压早期移民的晋升空间,抑或促使他们向上流动,这种效应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提高,充分显示出高技能移民群体内部竞争的激烈程度。

从宏观整体视角看,移民的流入为城市乃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创造了显著的“移民盈余”。有研究显示,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外来移民对城市本地劳动者产生的福利效应分别约为0.98万亿元、1.43万亿元、7.07万亿元和11.54万亿元^[2]。这一巨额盈余主要来源于多个方面:首先,移民通过技能互补促进了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提升了整体劳动生产率^[7]。其次,移民作为消费者和创业者,扩大了市场需求,激发了经济活力。最后,他们填补了本地劳动力不愿或不能从事的岗位,保障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消除移民限制,所能释放的经济效应将更为可观。

外来移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呈现出多层次且异质性的复杂状况,总体来看平均效应较为微弱,但其掩盖了内部存在的剧烈结构性分化,高技能移民会对本地高技能劳动者构成竞争,低技能移民对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影响不大,这是其核心特征之一。行业进入门槛越高,竞争效应就越明显,移民群体内部还存在新老更迭效应。不过从宏观层面去审视,移民依靠互补、分工以及创造需求,给予了巨大的整体经济福利也就是移民盈余,理解移民影响的最关键的是抛弃“整体论”,从技能结构、行业特性等多个维度展开细致分析,以此为制定精准且科学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三、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外来移民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之际,还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制度性挑战,这些挑战源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本身具有的分割特性,在移民因素的催化作用下变得更加突出,成为妨碍劳动力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融合的障碍。

(一)市场分割深化与就业竞争的结构性失衡

中国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而是存在着基于户籍、地域、部门以及所有制等多重分割状况,外来移民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时候,首先遭遇的便是这种制度性分割所带来的壁垒,这种分割并非均匀地对所有群体产生影响,而是造成了竞争的结构性失衡问题^[8]。一方面,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就业替代效应存在十分突出的技能异质性情况。高技能移民由于和本地高技能劳动力在知识储备、专业技能方面有较高的同质性,更容易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对后者的就业岗位以及工资水平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讲,市场呈现出一种“隔离下的竞争”或者“互补下的排斥”态势,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大多时候依赖于本地社会网络以及制度性保护,而外来低技能劳动者大多聚集在门槛较低、流动性较强的行业,两者在就业领域上虽然有一定的重叠部分,但是因为市场分

割的存在,并没有完全处于同一个竞争平面,反而形成了某种基于户籍身份的“职业隔离”现象。

(二) 户籍制度的刚性壁垒与公共服务获取不均

户籍制度乃是致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状况的最为关键的制度性根源所在,它恰似一道“隐形围墙”,把外来移民非户籍移民阻隔在完整的市民权利以及公共服务体系之外^[9]。因为无法平等享有本地公共服务,移民家庭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费用,这挤压了其实际可支配收入,又降低了其长期留居以及融入城市的意愿与能力。另外户籍关联的福利差异歪曲了劳动力的真实成本与流动决策,企业雇佣本地户籍人员或许承担着更高的显性工资,不过隐性福利成本较低,而雇佣外来人员虽说显性工资可能较低,然而员工因缺乏保障而出现的流动性高、技能积累意愿低等问题,反倒可能增加企业的长期管理成本以及培训成本。这种歪曲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无法全然依照市场效率原则进行,也对企业构建稳定的、高质量的劳动力队伍形成了妨碍。

(三) “低技能排斥”倾向与城市发展隐患

近些年来,不少特大城市在制定人口以及人才政策之际,呈现出较为突出的选优排劣态势,也就是借助设置各类显性或者隐性门槛,想要吸引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同时限制或者疏解低技能劳动力,这样的低技能排斥政策取向忽视了劳动力技能互补性在城市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效应对城市创新以及高端产业发展十分关键,然而其高效的工作与生活同样离不开一个由众多低技能劳动力支撑的生活服务体系,人为地排斥低技能劳动力,必然会破坏城市内部原本固有的技能互补生态,致使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供给短缺、成本迅速上升,引发“用工荒”“天价月嫂”等现象。这推高了全体市民的生活成本,最终还会削弱城市对高技能人才吸引力,损害城市竞争力,形成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10]。

(四) 技能错配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适配性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迭代对于劳动力技能结构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然而当下外来移民的技能供给跟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着错配风险,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低技能移民集中于传统服务业与建筑业,他们技能提升的速度或许难以跟上产业自动化、智能化的进程,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风险^[11]。另一方面,尽管高技能移民数量有所增长,然而其专业领域有可能和本地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间存在偏差,又或者其国际认可的资质与国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无法衔接,引

发“人才高消费”或者“技能贬值”这类现象,最终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致使移民难以获取准确的职位需求信息以及有效的职业培训渠道,这加重了技能错配问题^[12]。这种错配对移民个体的人力资本回报以及上升通道形成了制约,而且在整体层面使得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有所放缓。

四、政策建议与策略选择

为了应对前面提到的那些挑战,实现外来移民经济红利的最大化并且推动社会融合,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有系统性的建议。

(一) 深化户籍与公共服务改革,破除制度性壁垒

当下户籍制度以及其附属的福利安排依旧是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及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妨碍因素,消除这一妨碍是释放移民红利的必要条件。

可以推行有梯度性、精准性的落户政策,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当中,可构建“居住年限积分互认”机制,让移民在不同城市所积累的居住年限、社保缴纳记录等可连续计算,逐步获取市民身份以及相关权益。这样做可降低低技能移民的落户门槛,回应了研究中发现的“低技能排斥”问题。

须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改革的本质是福利分配的改革。可配套设立“新型城镇化专项基金”,重点支持随迁子女教育扩容、保障性住房供给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提升,从根本上解除移民家庭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可加快探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全国统收统支+便携式账户”模式,彻底打破社会保障的属地化桎梏,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提供坚实支撑。

(二) 构建全国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促进要素自由配置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乃是提高经济效率以及增加移民盈余的关键渠道,鉴于此情况,要在市场与政府这两个层面一同采取行动。

清除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区域壁垒以及歧视性政策,提议施行“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负面清单”管理方式,针对各地在就业准入、职业资格认证、同工同酬等政策展开联合审查和清理工作,动态废止所有基于户籍身份的歧视性规定,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推动岗位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实现高效匹配,降低移民的求职成本以及摩擦性失业情况。

可实施大规模、系统性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针对研究中发现的低技能移民与本地劳动力职业隔

离固化问题,政府可引导企业和社会机构,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普惠性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其向上流动,打破行业隔离。这对于化解潜在的结构性失业风险、提升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至关重要。

(三)实施差异化与精准化的人才引进与融合策略

移民群体内部存在巨大的异质性,杜绝“一刀切”,需根据其技能水平进行精准施策。

对于高技能国际人才,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技术移民制度。可建立基于年龄、学历、专业领域、工作经验的积分评估体系,简化签证与居留流程,为其提供国际化科研环境、职业发展通道和便利的生活服务,旨在吸引并留住全球顶尖人才。

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而言,管控的重点需要从以往的“限制防范”转变为“融合保障”,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低技能劳动力乃是城市正常运行以及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其具有非替代性,更多的是因为自身竞争能力欠缺,而非充分竞争所导致的结果。相关政策应当着力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证他们可获得同工同酬的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以及生活条件,并且依靠开展培训来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以此促进他们实现社会融入以及经济地位的提高。

(四)建立健全数据监测与政策评估体系

科学的决策过程需要精准的数据作为支撑以及持续的评估来保障,当下我国在移民动态监测数据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可考虑整合国家人口普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保以及税务等多种来源的数据,以此构建“外来移民就业与融合动态数据库”,对移民的规模、结构、分布、就业、收入以及流动趋势进行实时跟踪。

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上,需要构建起常态化的政策评估以及调整机制,采用科学的方式定期评估各项移民和就业政策的实施成效,像是落户政策、培训项目对于就业率、工资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依据评估得出的结果及时对政策给予动态优化和调整,以此保证政策有效性与针对性。

综合来看,借助上述四位一体的策略组合,可系统性地破解劳动力市场分割难题,促使外来移民从流入状态转变为融入状态,最终达成其个人发展与

城市经济繁荣的有机统一,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劳动力支持。

五、结语

外来移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呈现出复杂且有结构性的特点,一方面会带来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可创造互补红利以及宏观经济效益,在面对市场分割、技能错配等挑战时,要依靠深化户籍改革、构建统一市场、实施精准政策等方式,推动移民融入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BORJAS G J.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M]//The New Immigra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Routledge, 2018: 1-52.
- [2] 颜品,原新.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J].财经研究,2017,43(1):51-62.
- [3] 吴伟平,王振军,叶良宇,等.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基于移民盈余框架的经验分析[J/OL].财经研究,1-16 [2025-09-04].<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41228.101>.
- [4] OTTAVIANO G I P, PERI G, WRIGHT G C. Immigration, Offshoring, and American Job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3(5):1925-1959.
- [5] BORJAS G J.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335-1374.
- [6] DUSTMANN C,FRATTINI T,PRESTON I P.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along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3,80(1):145-173.
- [7] OTTAVIANO G I P,PERI G.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Us Wages and Rents: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M]//Migration Impact Assessme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2: 107-146.
- [8] 周正柱,周鹏.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J].劳动经济研究,2022,10(2):121-139.
- [9] 马草原,倪修凤.“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出效应与收入分配[J].南开经济研究,2024(3):99-119.
- [10] 吴伟平.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分工的视角[J].社会科学,2020(2):74-84.
- [11] 陈阳,王露,程亮.工业机器人应用、劳动力质量与共同富裕[J].统计学报,2023,4(3):68-79.
- [12] BILGILI Ö. Evaluating Impact: Lessons Learned from Robust Evaluations of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Policies [J].MIPEX Project. Available Online,2015.